

笔谈

慈诚加措  
伊利夏提  
凯大熊  
胡平  
何包钢  
钟伟锋  
张伦  
夏明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4期  
2024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 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 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统一与分离：中国民主转型中的民族问题

**编按：**当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发生时，民族问题可能成为最具爆炸性、挑战性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知识人、活动在分子在统一与分离问题上一直存在重大的分歧。不少汉族学者、活动在分子主张维持国家的统一，引进联邦制来容纳民族多样性问题；也有一些人认为必须破除“大一统”，将中国分裂成若干甚至许多小国。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目前主张寻求西藏高度自治而不是独立的“中间道路”，但是也有的藏人特别是年轻的流亡藏人对此并不认同。流亡维吾尔活动在分子则似乎普遍主张将来独立建国，恢复民国时期曾创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南蒙古活动在分子也有人主张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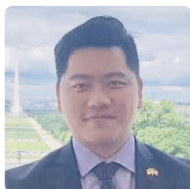
这种分歧根植于深刻的历史、宗教、文化、语言和现实等多种因素。主张维持统一与要求或支持分离的人之间，似乎难以相互说服。

在目前共产党政权的极端、残酷控制之下，无论是引进联邦制保障真正的自治、还是某个或几个地区独立出去，都明显没有可能。但是，当未来民主转型发生、政治控制松动的时候，统一与分离的力量，如果处理、应对不好，却有可能发生激烈碰撞。结果，可能给强硬派机会，甚至造成流血冲突的悲剧，并导致转型的复杂化乃至失败。如何评估、管控这种风险？是否应该将成功建立民主的政府、框架作为优先考虑，然后在民主的前提下、以民主的方式处理统一与分离的问题？

无论是维持统一还是追求独立，都需要经历一个政治过程、遵循一定的程序。如果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在政治上如何操作，特别是以什么过程、制度安排来获得主要非汉民族的赞成，将统一建立在不同族群同意的基础之上？如果追求独立，如何经过选举产生必要的权威机构、遵循什么程序来获得分离？统一派与分离派是否可能达成某种基础程序共识，从而有助于民主转型的成功、统一或分离过程的和平、避免悲剧性的冲突？

这些问题值得给予特别关注和讨论。为此，《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了部分专家、活动人士进行了以下笔谈。笔谈参与者们的立场、观点有很大差异，

正如统一与分离的问题存在重大分歧。本刊作为公共平台，致力于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相互了解。



**慈诚加措 (藏人行政中央驻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

讨论中国民主转型后统一或分离的话题之前，我想给读者分享一下，最近在纽约成功举办完成的长寿法会。北美地区的藏人与该区蒙古和喜马拉雅地区的信众，为尊者达赖喇嘛举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寿法会。一万八千多位来自北美各地的藏人和信众，在纽约长岛的瑞银体育馆聚集在一起，为尊者永久长寿祈祷，并见闻尊者响彻云霄的教导。尊者在纽约期间，中共在境内外转发各种虚假信息，挑起疑惑并创造混乱。如此大规模的聚会在北京的弥天大谎给了一个彻底的打脸，显出藏人民众所向的是尊者达赖喇嘛，而不是中共这个雪域高原上的不速之客。

很多华人知识和活动分子担心中国民主转型发生时，民族问题是最大的挑战之一。但是把藏人的问题只看成“少数民族”问题或中国视角的“涉藏”问题，是缺乏对西藏全面的认知。藏中问题不能只在民族冲突的角度分析。藏人的问题不仅涉及到两个族群的和谐，还与普世人权、与多国的地缘政治、全球环保、水域安全等很多重要的全球化问题有着关联。我觉得关心西藏的朋友需要知道，藏人上千年来一直是雪域高原土地上最大多数的人。中共的解放军侵占藏区之后，才有了少数民族的概念。在目前中共控制下的藏区，怎会有藏人在自己土生土长的故土称自己为少数民族？

对藏人的压迫已七十五年。虽然中共一直用物质利益激励汉人去西藏生活，但这一政策也开始反弹。援藏干部和为经济利益做生意而来的汉人，最终

还是选择离开，回到自己的故土。藏人始终是雪域高原上生活的最大多数的人。藏区的环保对整个地球的重要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环境科学家的承认。西藏的水源，直接对亚洲很多国家生死攸关。国际水源安全论坛开始邀请藏区环保研究员，特别分析藏区水源的重要性。西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博大精深的佛学知识，在世界各地已有众多的追随者和研究者，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共存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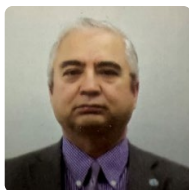
所以讨论西藏时，我希望华人知识分子们不要忽视藏人国际化的影响力。

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我想从尊者对中国民主转型的看法和推荐中间道路的解决方案谈起。尊者和绝大多数藏人支持中国民主转型。我们相信一个民主的中国，不仅有利于藏人的全面自治，也有利于解决当下中国的很多问题。尊者多次提到，中间道路对藏中问题的解决是双赢的方案。在中国保持对西藏主权的同时，藏人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条列，保护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加上藏人还可以从中国得到经济物质上的帮助。这是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实行的、西藏人民议会一致通过的、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在跟中共对话时，藏人要求的是中间道路、名副其实的自治。我们相信民主转型后的中国会在联邦制下，给藏人更自由的待遇和选择。

对于转型后统一或分离的问题，就在中共政策已使藏人面临着语言文化被摧残、种族灭绝的状况之时，大多数藏人依然是十分相信尊者主张的中间道路，因为寻求独立是不实际的方案。在支持藏人的华人朋友里，大部分都支持中间道路，而不希望西藏独立。但是也有华人朋友支持藏人拥有自决权，甚至表示独立都是尽情尽理。习近平上台后，因针对藏人的打压越来越恶化，支持藏人拥有自决权的华人知识分子也增加了。藏人里面寻求

独立方案的活动分子是少数。虽然流亡藏人中追求独立的年轻人在增加，但这也是因为北京越来越恶化的政策，让一部分藏人失去了对中共的最后希望。我想指出，任何一个藏人民间组织，都以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非暴力运动方案为中心，为自由西藏的运动出力。我觉得年轻一代的专注其实是自由而不是政治独立。

如果中国有民主这一天，藏人的命运应该以境内藏人的声音为主而选择。从我对境内藏人和流亡藏人的了解，最终会请求尊者达赖喇嘛做决定。而尊者已经完全退休，把所有政治工作都留给了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藏人行政中央。所以藏人行政中央的政策会成为藏人最终的趋向。而藏人行政中央的政策，只能通过直接民主规则才能改变；也就是说，中间道路的政策，只有西藏人民议会通过人民公投的过程才能改变。当时机成熟到讨论统一或分离之时，藏人会通过尊者达赖喇嘛在流亡六十多年来辛辛苦苦建造的西藏民主制度，而做出决定。



**伊利夏提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东突厥斯坦及其土地上的人们，直到满清帝国被孙中山等中华主义者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推翻之前，无论从历史记载上看，还是从文化属性、从信仰上看，甚至从行政隶属上看，都不属于中华帝国，不是中华的“部分”；因而，也不存在“分离”一说。这是历史事实，铁证如山。对居住在东突厥斯坦、从未属于过中华文化圈的维吾尔等突厥民族而言，共产党中国政府崩溃以后的选项，不是“分离”，而是恢复独立。由近代维吾尔人、藏人的遭遇可知，中华帝国政权一旦稳固下来，无论民主还是威权，都不会让任何民族和平实现独立。

实现独立的一个基石性的要素，是该区域人们坚定的独立意愿。东突厥斯坦土地上的人们，无论是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还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那块儿土地上的其他民族，都有坚定的、强烈的独立意愿；上世纪两次独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及其尝试，就是明证。如果没有坚定的独立意愿，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及其他坚定信仰的突厥裔穆斯林、非穆斯林，就不会遭遇被文明世界称之为 21 世纪人类文明污点的、史无前例的维吾尔种族灭绝。

实现独立的路径是什么？历史没有规律，历史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尽管我们依据历史的必然性坚信，中共政权一定会垮台；但我们无法预料中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时间垮台。在此情况下，制定独立或统一的路径，只能是纸上谈兵；但这并不意味着，有独立意愿的民族，不能有一个独立路径的框架性思路。

纵看历史，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大多数是帝国崩溃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皇帝国战败崩溃后，各民族国家的独立；二战后，英法帝国的衰败，使得亚非拉各民族国家获得了独立的机遇。

横看近代各国独立历史，无论是满清推翻后蒙古国的独立，还是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下的以色列建国及遗留至今的巴勒斯坦建国难题，无论印巴分治、孟加拉国（东巴基斯坦）的独立，还是苏联垮台后各加盟共和国（包括中亚五国）的独立，上世纪末东帝汶独立，南联盟解体之后的各国独立和科索沃的独立，都是在帝国解体之际或立即宣布独立，或以坚定的意愿付出牺牲，才实现了独立之梦想。

无论纵看还是横看，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帝国崩溃之际宣布独立，并做好了独立准备的民族，基本上都成功了。而那些准备不足的民族，即使有坚定的独立意愿，也最终在老帝国的废墟上，被深具大一统情结的野心家建立起来的新帝国继续占有。如俄罗斯占领下的车臣、鞑靼斯坦等，中国占领下的东突厥斯坦、图伯特、南蒙古等。

满清帝国的被推翻，最主要的原因，是紧接武昌起义之后，被革命党视为要“恢复”的“中华本土 18 省”之宣布独立！伴随各省的独立，作为外来统治者的满清朝廷，无兵卒，只能被迫接受袁世凯的城下之盟，宣布退位，接受共和。现今蒙古国之所以得以独立，并不完全是苏联的支持，而是蒙古国先贤利用满清帝国崩溃、各省宣布独立、中央集权空虚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坚定的独立意志，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立即宣布独立而得以实现的。如果蒙古国当时的建国先贤们，梦想着等待中国实现民主后再宣布独立的话，今天他们就是中华民族“56 朵花”中的一朵了！

如果苏联崩溃临近之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不宣布独立，顽固派政变失败苏联崩溃之际，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甚至俄罗斯也不宣布独立的话，而是等待大一统俄罗斯实现民主之后，再选择独立或联邦、邦联的话，那么中亚五国的命运，都不会比今天的乌克兰和车臣的命运好太多。

现今的俄罗斯和中国，都是披着现代国家外衣的帝国，是以扩张主义为其核心价值观之帝国时代的残留物。大一统是违背自由民主的极权残留物，我们应该坚决反对任何以民主的外衣，试图复活中华帝国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野心家的招牌，民主的绊脚石。希特勒以民主选举上台，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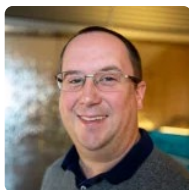
动了扩张主义的二战；普京以民主的名义选举上台，以反法西斯、保护俄罗斯人利益为名占领克里米亚、侵略乌克兰；习近平也声称“全过程民主”连选连任，今天还在咄咄逼人地以九点线为界吞并全部南中国海，还要武统台湾。

等待宗主国实现民主后，再实现独立，这是个白日梦。最典型的例子是加泰罗尼亚的独立梦在西班牙的落空。西班牙不仅是民主国家，还是欧盟成员国，但西班牙政府一直拒绝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诉求，拒绝公投，并逮捕监禁独立运动领导人，使加泰罗尼亚不仅成为西班牙民主的污点，也使欧盟左右为难。

因而，实现独立的路径简单而又清晰：有坚定的独立意愿，做足准备工作，等待帝国之崩溃，立即宣布独立。如果可能，邀请联合国、或西方盟国派遣维持和平部队，再进行独立公投确认独立之事实。同时也需要宗主国的精英要有宽广的胸怀、文明的素养、对法治的忠诚；当然，诉求独立的民族也要有妥协、宽恕的精神，如大英帝国在苏格兰公投中所展示的百年民主、包容、宽容之涵养，和苏格兰人在公投失败之后的坦然。

至于应该是先民主后独立、还是先独立后民主，有点类似于“鸡与蛋”谁先谁后之争。但依据历史的案例来看，独立促成民主得以实现的例子，远多于民主之后和平分家的例子；蒙古国、乌克兰、格鲁吉亚、科索沃、东帝汶、台湾，都基本实现了民主，虽然有反复，但民主思想基本扎下了根，民主体制站住了脚。





**凯大熊 (Kevin Carrico,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中国研究高级讲师):**我要说一句基本上没有人敢公开说的话——我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成多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

关于中国民主化的讨论已经很多；相比之下，关于中国去殖民化的必要性的讨论却很少。我认为，去殖民化（即给予前清帝国人民自决权）与民主化同样重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没有去殖民化，民主化就无法真正实现。

目前被称为“中国”的这个地缘机体是从清帝国继承下来的，与传统概念中“中华文明”的地缘机体大不同。然而，在其他大帝国早就解体之后，大清帝国的继承者中共仍然在广阔的范围内保持独裁统治，甚至试图将殖民独裁的黑手伸到香港与民主自由的台湾。

中华帝国通过两个互相补足的意识形态保障其特殊稳定性。

第一个意识形态是受害者思维。“中国作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就无法作为殖民者”，这是错误的逻辑。在中国国内，这个意识形态培养了一个很普遍的受害者心态，让人错误地将中共独裁体系理解为把中国人民从外国殖民与压迫解救出来的解放者。在国外，这种意识形态反映了西方普遍错误地把殖民主义理解为一个纯粹“西方”的现象，甚至自相矛盾地将对中共殖民主义的批评视为一种新殖民主义行为。

第二个意识形态是多民族自治国家的神话。在中国国内，这种意识形态颠倒了受害者思维，宣扬自豪感，以文明的名义美化独裁与殖民主义压迫。在国外，这种意识形态分散了对当今中国现实的讨论，将一些毫无意义的

所谓“少数民族”服装与风俗视为多样性的表现，同时错误地将这些毫无意义的现象理解为一种深层的知识（在中国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中，这种错误的逻辑也很普遍）。

这两个意识形态不仅维持中华帝国主义的霸权，同样也阻碍真正的民主化。因此，我认为去殖民化与民主化是两个互相补足、不可分割的过程。不过大家都知道，去殖民化与民主化这些事情总是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去殖民化会是个什么样子过程呢？我先提出两层互相补足的过程：政治去殖民化与文化去殖民化。

在政治层面，各个省、自治区、县、市，与其他地区必须有机会通过民主辩论和全民公投来决定自己的未来。我必须在此特别强调，我不仅仅在说所谓“少数民族”的地区。

西藏、东突厥斯坦和南蒙古人民当然必须有机会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未来，免受北京无处不在的干涉与压迫。同样，前清帝国所有的人民，无论中共的民族划分有没有把他们看作“民族”，必须有机会决定自己的命运。当然，目前被中共殖民政府占领的香港人民会欢迎这次“香港民族，命运自决”的机会。同样，已经在大中华帝国主义威胁之下开启了去殖民化过程的台湾人民，会趁这个机会让中国与世界承认台湾共和国的真实性。

不过除了这些明显的例子之外，汉族的沿海地区还有丰富的多样性文化。我们除掉不合时宜的天下大一统独裁思维之后，就能发现广东、河南、上海和黑龙江没有必要都属于同一个国家或整体的这些不同地区显然有不同的文化，也有可能有不同的民族与不同的未来。当然，有些地方希望保持

统一，不会选择独立建国，这毫无问题。最关键的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化，将来的统一（或分裂）必须是建立在人民自愿选择的基础上，而不是通过数千年来的集权统一思想。无论其背景，所有的人必须有一个机会公开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文化层面，未来的民主共和国需要合作建立一个类似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支持上面所说的政治过程。这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首先要关注受害者，收集各种民族压迫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证据，公正地记录历史，并寻求合适的赔偿。同时，该委员会也会收集压迫者的证词，并在合理的情况下给予特赦。该委员会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寻求真相、问责和正义，通过了解过去和展望未来建立民主和平共处。

去殖民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禁忌（通常被称为“分裂主义”），当然会有很多人反对我这些提议。一些批评者会说这是企图将中国巴尔干化，暗示去殖民化过程会导致暴力冲突与民族灭绝。面对这样的批评，我也只能说他们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巴尔干化。最近的“巴尔干化”例子，即前南斯拉夫的种族灭绝，并不是因为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民主化而发生的。正好相反，前南斯拉夫的悲剧是铁托政权数十年压迫所积累的种族相互敌对和仇恨的产物。

我们今天在中国能看到同样的压迫。正是这种压迫会导致民族仇恨、对立与暴力：中共才是中国“巴尔干化”的幕后黑手。那些将中国去殖民化称为“巴尔干化”的人，不仅根本误解了“巴尔干化”这个概念，而且因为替中共大一统殖民压迫辩护而真正会导致将来民族之间的仇恨与暴力冲突。

为了摆脱这种恶性循环，中华大地的未来必须建立在民主化和去殖民化的基础上。百家争鸣，百国齐建！



**胡平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统独问题是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必然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此前，我写过三篇文章《论统独问题》、《从阿马利克的〈苏联能存在到 1984 年吗〉谈起》和《兼顾理想与现实》，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后收入《要得公道打个颠倒——中国民族问题与民主转型》一书。这里，我再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我看到有不少人提出独立的主张，但是我几乎没看到有哪家独派人士提出过实现独立的路线图。

要避免胡适批评的“目的热、方法盲”。我以为独派人士需要提出自己的路线图。因为我们不可能凭空创造历史。我们总是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去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不能只提出我们的目标，却忽略实现目标的方法。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提出路线图，就是要考虑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是大概率什么是小概率，考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说明：这里说的独立，既包括藏独、疆独、蒙独等民族独立，也包括港独、粤独、川独等地区独立；但不包括台独。台湾另当别论。又，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用武力争取独立缺少现实可行性，这里也不讨论。中国独派的路线图可以有多种方案，但原则上都应该是如何用和平的、民主的方式实现独立。这本身就意味着，首先，我们需要同心协力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基本人权，建立宪政民主。然后，才可能把独立问题提上日程。

我先前批评港独：你想追求香港独立，那么在现阶段，你也应该首先追求真民主真普选。因为只有实现了真普选真民主，才可能通过公投法；只有通过了公投法，才可能通过公投而宣告独立。可见，实现政改、实现真普选真民主，是推动港独的前提。依据同样的逻辑，我提出，作为藏独派，在当前也应该支持中间道路，也要把实现民主和真正的自治当作现阶段的目标，当作第一阶段的目标，而把独立的目标放在下一个阶段。在现阶段，主张西藏独立的人士应该和主张中间道路的人士站在一起，首先为争取真民主真自治而共同努力。

现在，有不少人提出，汉人的大一统观念是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必须破除大一统观念。但问题是，只有在实现了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我们有了充分的交流与争辩，才可能削弱汉人中的大一统观念。如果在民主转型的初期，在藏人、维吾尔人以及主张中国必须分裂的少数汉人和持有大一统观念的大部分汉人还没有认真地展开广泛的对话与沟通之前，就迫不及待的提出独立高呼分裂，大部分汉人必然会用他们原有的大一统观念做出强烈回应，其结果必然是使得很多本来有可能同意或默许的汉人成为对立面，那正好给本来已经边缘化的专制势力借助于大部分仍持有大一统观念的汉人卷土重来的机会，从而使得原本已经开启的民主转型毁于一旦。那将是我们共同的悲剧。这样的错误我们犯不起，必须努力避免。



**何包钢（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

未来中国民主转型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选举的序列。

一种选举序列是从村级选举到乡镇选举、县市选举、省级（包括西藏和新疆）选举，再到全国大选。另一种序

列从基层选举后直接进入全国选举，然后返回来再举行省一级的选举。两

种不同的选举序列，跟处理民族问题有紧密的联系。民族问题涉及到多方面的复杂因素，这里我只专注于选举序列这一视角。下面我将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来阐述这两种选举序列。

一是全国性选举先于地方自治的选举。西班牙的民主化经验表明，1976年和1977年的全国性选举为国家提供了重组政体和与分裂主义者谈判的合法权力。结果是，没有任何重要的全国性利益集团或政党对国家制度进行指责。两三年后，在1979年西班牙举行了关于向自治区下放权力的公投。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纳瓦拉地区要求独立的人口比例显著下降。此外，选举为西班牙国家的统一提供了一个政治契约和强大的合法性。巴斯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在该地区的公民投票中获得了94.4%的赞成票。这次公投可以被解读为巴斯克地区与西班牙国家签订的契约，根据该契约，巴斯克地区在承认西班牙统一的前提下获得了自治权，西班牙国家也利用这个契约用武力镇压一些极端独立分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化能够为民族身份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尽管公众对恐怖组织埃塔（ETA）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仍有一小部分巴斯克人要求独立。

另一种顺序，是地方共和国选举先于全国性选举。前苏联的三重变化——边界重塑、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显示了民族身份问题的解决与民主化同时发生，而且地方共和国选举先于全国性选举。虽然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试图通过设置脱离联邦的程序性限制（如要求三分之二多数）来将民主化与独立分离运动分开，但反对派并不接受这些中央强加的限制。1987年夏天，在苏德条约签署周年之际，苏联最重要的民族争端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公开论坛中浮现。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决裂。在1990年2月24日，立陶宛共和国

和地方苏维埃举行选举，那是立陶宛自 1940 年被苏联占领以来首次举行自由选举，立陶宛人民选出了最高委员会（立陶宛的立法机关），其中萨尤迪斯（Sąjūdis）运动的候选人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选举结果促使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在 1990 年 3 月 11 日宣布立陶宛恢复独立，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戈尔巴乔夫于 1990 年 3 月 15 日当选为苏联的首任总统。但是这是一个迟到的选举，未给他带来足够的合法性。虽然戈尔巴乔夫尽最大努力维持苏联的统一，但他缺乏能力和合法性来做到这一点。早在 1988 年，俄罗斯民主组织就与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了联系。到 1990 年，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鼓励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共和国“尽可能多地争取主权”。叶利钦也公开挑战戈尔巴乔夫，声称其是由俄罗斯联邦议会选出，而后者缺乏民主选举的合法性。

上面两个案例似乎证实一个选举序列法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选举序列是影响统一或分裂结果的一个因素。全国性选举先于省级选举，这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的序列。省级选举先于全国性选举，这是有利于少数民族争取独立的序列。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必须思考民主选举序列，一个涉及到国家统一和分离的重大问题。比较政治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素材和经验。



**钟伟锋（乔治梅森大学默卡特斯中心学者、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高级顾问）：**首先，民族问题的本质其实是国家分裂问题。（如果中文的“分裂”听起来带有贬义，

那是因为中国法律视之为严重的刑事罪。但国家分裂在世界史上并不罕见。英文的“secession”在英语里也是一个可以理性讨论

的中性词。)当然,人的本性往往偏好于由同种族和语言的人组成一个国家,所以分裂问题才常常被简化成民族问题。

民主的中国也许不会再把分裂视为讨论的禁忌,但是分裂问题即使在成熟民主国家也颇有争议。(例如英国的苏格兰、加拿大的魁北克、以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问题难在,民主或民族自决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某个族群或地区(无论是新疆、西藏还是魁北克、加泰罗尼亚)就有权从所在国分裂出来。分裂不但影响有意离开的族群,也影响它的所在国。如果加泰罗尼亚人以民主之名就公投决定是否离开西班牙,那其他的西班牙人是否也可以以民主之名公投决定让不让加泰罗尼亚离开呢?

因此,民主并不是分裂的充分条件。但是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却是和平解决分裂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无论在实践或是学术上,对退出权(right to secede)最有力的论据,是所谓的正义动机理论(just cause theory)。例如,如果一个族群受到其所在国的严重迫害,那么该族群就有正当理由要求分裂出去。当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76年宣布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进而成为现在的美国)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正义动机就是这些殖民地被迫向英国缴纳重税,却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近几十年来饱受伊拉克政府镇压的库尔德人,是另一个例子。2017年库尔德人在伊拉克政府反对之下进行独立公投,不但独派得票92%,而且库尔德人的正义动机也得到了国际社会一定的认可。

从正义动机的角度来看,维吾尔人和藏人的独立主张,在当前中国政府的全方位的极端控制之下,似乎都有很强的依据。但是在中国有了民主之后,



在个人自由都得到真正平等的保护之后，中国民主制度又该如何处理维吾尔人和藏人的独立主张呢？

我们可以参考成熟民主国家处理分裂问题的经验。在英国，许多苏格兰人认为英国国会常常不反映他们的政策偏好。（例如英国“脱欧”在苏格兰只得到 38% 的支持。）英国的宪法并不禁止独立公投，但是举行公投必须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而公投结果也具有约束力。苏格兰在 2014 年就举行了一次这样的公投，并且以独派得票 44.7% 而告一段落。

加拿大处理魁北克问题和英国类似，只是独立公投的结果没有约束力。但是加拿大宪法要求，如果独立得到多数赞成，加拿大政府必须与魁北克政府展开有诚意的谈判。魁北克 1995 年的独立公投，虽然独派以 49.4% 的得票险败，但是加拿大在公投前仍然对独派胜出的可能性作了一定的准备工作。

相比之下，西班牙的模式更不利于分裂问题的和平解决。西班牙宪法虽然赋予了加泰罗尼亚高度自制，但却禁止加泰罗尼亚进行独立公投。也许是因为禁果效应，加泰罗尼亚近年来反而多次举行违宪的独立公投或者单方宣布独立，而西班牙政府也多次动用军队进行镇压。结果是加泰罗尼亚人的独立主张反而给西班牙带来了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新疆和西藏等民族问题在民主的中国要得到真正解决，关键在于中国的民主制度对少数人的权利（包括退出权）要有足够的保护。民主无论在哪里都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而民主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制度本身对这种暴政有没有足够的补救。



**张伦（法国赛尔奇 - 巴黎大学教授）：**多米尼克·斯娜

白这位继承了父亲雷蒙·阿隆学术事业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在其《公民的共同体：关于民族的现代观念》中写道：“现代民主是以民族的形式诞生的”。<sup>1</sup>这并非惊

人之论，对现代民主诞生的历史有过研究的人，大体上都会同意这种看法。因此，讨论民主常是离不开民族问题的；反之亦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往就复杂困难，现因全球化、移民、族群主体意识的强化、新型的信息技术的冲击，而更显尖锐，带来新的管理、制度调试和民主共识形成上的挑战，不仅对转型国家，即便是对那些传统的民主国家亦是如此。

多年来笔者不断提及的中国的“双重转型”（现代性及后共产主义转型）过程，因此又添加了新的必须要加以考虑的变量，各种民主与民族议题重叠、交织、矛盾，使得中国的民主转型必定充满诸多紧张。从一开始，民族与民主就是中国近现代政治转型中伴生、纠葛在一起的问题，这与世界上诸多国家近代民族（国族）与民主的建构过程有诸多类似之处。所谓“中华民族”的构建是与反清、缔造民国的政治动员密切相连的。满清已去，但这个超巨型、多族群帝国留下的遗产，迄今依旧困扰我们。为抵抗外侵，纳“四裔”入“中华”，“中华民族是一个”<sup>2</sup>等建构共同体的努力，让广阔地域上族群间文化与传统的差异性受到忽略，而共产主义强制划一的体制又让这种忽略达到极致，乃至可预见的是未来民主转型必面临诸多族群强烈的分离主张。如果处理不当，民族问题压过民主建设，将有可能使转型发生逆转以至失败。

较好处理此问题的前提之一就是，我们要对所处时代的内外部环境与问题的历史背景有尽可能清醒、完整的认识，冷却激情、强化理性，认识越清

晰深刻，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维持现状，先集中处理权力的民主化应成为一重要的策略原则。在这一点上，达成不同族群行动者尤其是精英的共识至关重要：民主的中国才会更公正处理民族问题。同时，为各种诉求寻找疏散渠道，不让对自主的渴望变成绝望，或可将一种未来承诺作为条件纳入转型共识，如法国在处理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独立问题上的长时段多次公投的办法——1988 协定规定十年后公投，1998 法律确定 2018 公投且可不超过两次经规定人数及代表要求有间隔的再次公投，以民主的方式解决民族的问题，努力达成一种尊重权利与理性考量双赢结果。



**夏明（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在 21 世纪，中国面临着几率增高的大规模流血死亡的三个议题：台海或者一场涉外的战争（南中国海）、经济深度危机带来的饥荒、中共政权崩溃引发的内战（尤其是民族冲突）。中国民主化的顺利有序转型会有助于避免上述三个危机。本短文着重谈中国民主化过程如何避免社群撕裂、族裔冲突带来的屠杀。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有必要破除一个前置的理论错误。这不仅是中国知识界（包括海内外）普遍的认知错误，也是困扰着当下这场讨论的第一个障碍。《中国民主季刊》编辑给我的写作邀请明确提出，在“维持统一”或“主张分离”的不同立场下，“不要将重心放在为什么要统一或独立上，而是着重说明如何、以什么过程维持统一或实现分离。”这个理论前置是西方社会科学界传统的学术范式，它是在经典物理学的大框架下，西方实证主义、经验研究、行为主义给西方政治科学设置的新教条。它的理论内涵包括唯物主义、无神论、目的论、决定论、还原论（reductionism）和本质主义。在机械物理学的影响下，追求实证、量化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强调主观意

识与客观性的分离、观念心性与实践过程的分离、价值判断和过程描述  
的分离。在二十一世纪，量子力学理论带来的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冲击，  
正在颠覆 19 世纪、20 世纪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并给我们贡献出一套新  
的认知方法。

量子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薛定谔在 20 世纪中期发表了《生命是什么？》《意  
识和物质》。他坦承通过阅读叔本华，印度《奥义书》中的“统一理论”对  
他产生影响。为此他把意识和物质、科学与宗教、东方思维和西方思维打  
通连为一体。在量子力学观的审视下，世界不是存在于最小的物质并以此  
反映出的本质，世界存在于一个虚空的网（场），而意识（记忆、期盼）  
在生命中发挥巨大作用，即“意识扮演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是上演  
世界中所有剧目的唯一舞台，或是包含整个世界的容器，容器外不再有任  
何物质。另一方面，我们获得一种印象，或许是靠不住的印象，在这个匆  
忙的世界中，意识和某一非常特殊的器官（大脑）密切相连。”由此我们  
可以理解，为什么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传佛教能够并乐于和量子力学对话，  
为什么达赖喇嘛采纳中间道路而拒绝把世界无限分割成碎片的主张。

有了这样的思维结构的量子跃进，我们才能解决中国民主转型中的统独之  
争。意识先行，过程才会产生。在中国即将跃入一个复杂的剧变前夜，最  
需要的是创作出一本《中国联邦党人文集》，系统论述统一在国家、洲际  
和世界层面的重要性。“中国”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只是一个动态的地  
域概念。“大一统”是秦汉专制体系的基础，而中共专制体系就是“秦始  
皇 + 马克思”，所以“大一统”必然是中国民主化的敌人而不是手段。在  
历史抽象逻辑中，“民族”没有创造国家，而是被国家创造。民族没有凝  
固不变的本质意义，而只是“想象的共同体”。汉族、藏民族、维吾尔人

等都没有“纯洁的血”，而无不是族群大融合的正在进行时的产物。今天的中国无论其优劣，其存在都不单是汉人的功业/罪过，而是“五胡乱华”、蒙古帝国、满清帝国的合力所为。现代最具有建立独立民族国家条件的满洲国以失败告终，宣告了民族自决在现代性压力下的困境。美国的民主建国、内战捍卫统一和在当下强化多元包容的合众为一，显示了广阔疆域的共和国在现代经济中的优势。欧盟的成立和演变，给亚洲如何处理主权（独立加虚化）提供了思路——亚洲民主共同体。面对缩小的世界和剧增的毁灭风险，人类不得不接受我们被抛进一个狭小空间共生共存的事实，同时寻求规范纠缠的治理体系。总之，我们不是在把世界分割得更小并从此无法收手的危险中找到希望，而是在把心性意识和物质世界合二为一的整体性思维中找到出路。否则，我们会看到一个红龙被屠的中国，被一群毒蛇瓜分引入洞穴。

在寻求思想观念的过程中，苏格拉底给自己一个“助产士”的角色，并认为助产士同时有两个功能：顺利催生引产正念，并毫不手软让邪念短命。在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当下关头，我们要勇于在统独问题上行使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打赢一场意识心灵之战。尔后，历史自然会尾随。

注释.....

- 1 多米尼克·施纳珀：《公民社区》[Dominique Schnapper, *La communauté des citoyens : Sur l'idée moderne de la nation*, (Paris, Gallimard, 1994), p.13]。
- 2 就民国抗战期间这方面的相关论述，可参见葛兆光《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相关讨论（香港，牛津大学，2014）。



黄奕信画作